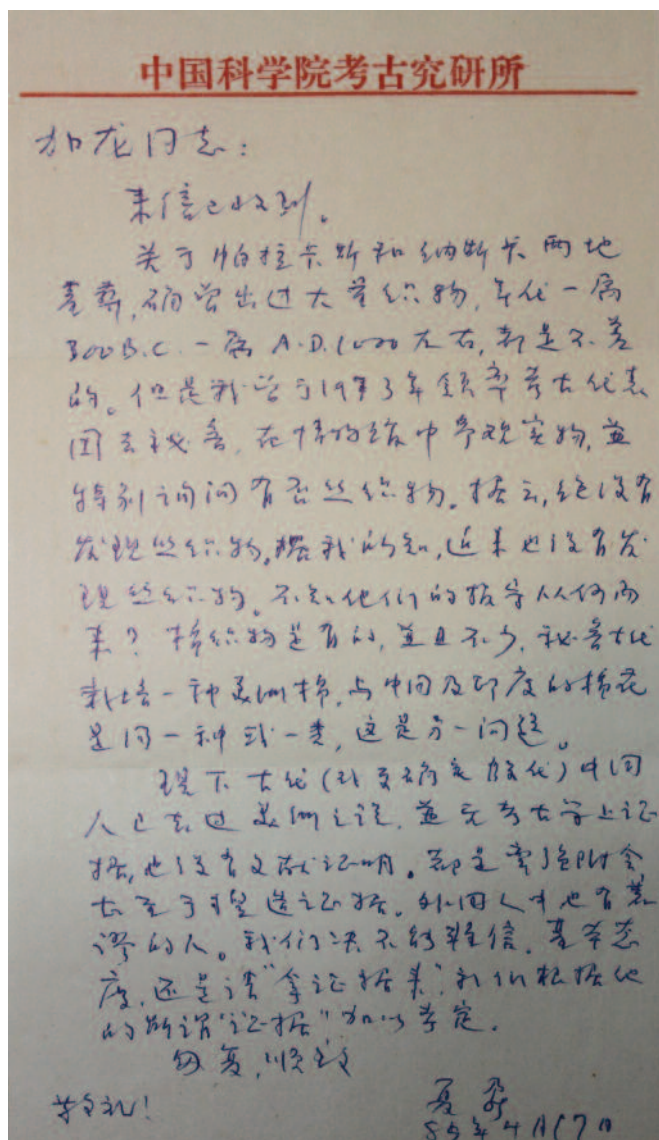


《夏鼐日記》所見當代學人：

從陳寅恪、傅斯年、郭沫若、陳夢家到張光直



夏鼐致作者的信函（1985年4月17日）

梁加農

（原中國浙江絲綢工學院絲綢史研究室副主任）

古今論衡 第30期 2017.10

二〇一一年出版的著名考古學家夏鼐（1910-1985）的十卷本、四百三十八萬字的日記（以下簡稱日記，引用只注卷數和頁碼），^❶起自一九三一年，終於一九八五年，是他從清華大學、倫敦大學求學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歷時五十餘年的詳實、連續、完整的日記，頗有史料價值。茲將翻閱所見有關當代歷史、考古學人的一些新資料過錄如下，略加釋讀，以期引起研究者的關注。

一、夏鼐與陳寅恪

一九三四年初在清華的日記裡，記有所修陳寅恪「晉南北朝隋史」的期末試題，「（1）試釋『五胡十六國』一名辭之涵義；（2）試述北魏六鎮之亂的前因後果」（卷一，頁214）。不過，夏鼐並沒有參加考試，因為可以論文代考。發榜時，夏得了最高分，也是班上唯一的S⁺（S即Standard及格——引者注）。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張星烺教授的宋遼金元史，考試「馬馬虎虎」，得E（即Excellent優秀——引者注）者頗多。夏的論文還有陳寅恪的評語：「所論極是，俱見讀書細心，敬佩！敬佩！」（卷一，頁218）。

夏鼐清華畢業考取中美庚款留學生後，仍關注著陳寅恪。倫敦大學求學時的日記，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記有獲知被聘為牛津大學漢學教授的「陳寅恪先生以戰事關係，已中止來英」（卷二，頁260）。一九四三年返國後不久去四川南溪李莊工作的路上，曾「擬謁陳寅恪先生，未遇」（卷三，頁104）。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夏在浙江大學任教授時，讀過發行不多的《嶺南學報》最新一期上陳寅恪關於元白詩的文章，還從到杭州的嶺南大學教授梁方仲處聽到已南遷廣州的「陳寅恪先生仍牢騷甚大」（卷四，頁305）。甚麼「牢騷」，日記沒有記。

不久，夏鼐接受中國科學院的聘約，北上到考古所就任副所長。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夏赴曾在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一起負責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團的老友、北京大學教授向達家中閑談。向達談及了陳的一些「牢騷」，說陳寅恪先生最近有信致北京大學教授周一良曰：「《元白詩箋證》分贈諸友，留一紀念，然京洛耆英，河汾都講，皆盡捐故技，別受新知，又不敵以陳腐之作，冒昧寄呈」（卷四，頁361）。

向達還向夏鼐轉敘了陳寅恪的詩《霜紅龕集》〈望海詩〉云：「不死不傷最堪傷，猶說扶餘海外王。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編按：《夏鼐日記》所錄首句疑誤，今本作「不生不死最堪傷」。〕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提到，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曾是夏鼐出國留學的指導老師、後為多年上司的中央研究院歷

❶ 夏鼐，《夏鼐日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卷一～一〇。

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在臺灣突發腦溢血去世後，陳寅恪寫過挽詩，並曾在一九五〇年代初寄給向達。但由於傅的政治身份——當年傅和胡適、錢穆三人是被毛澤東欽點的極少數「反面」知識份子，挽詩恐已不存於世。陸又引北京大學史學教授鄧廣銘的回憶，說挽詩可能就是這首《霜紅龕集》〈望海詩〉，不過認為此說尚待細考。^②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說，一九九五年「大陸上一位老史學家鄭重托人告訴我，這首七絕原來是為悼念傅斯年而作的」。^③這位「老史學家」是不是就是鄧廣銘，余沒有說。而日記為鄧廣銘之說提供了新的證據。夏鼐明確記道：「《霜紅龕集》為傅青主著，此詩蓋吊新逝世之傅公也」（卷四，頁361）。

此後，日記不再有陳寅恪的消息。一九四九年後，歷經各種政治運動特別是反右運動，大陸社會整體氛圍徹底改變，老知識分子三緘其口。一九五七年，同樣牢騷甚大的向達被劃為右派，一九六六年文革初遭批鬥後辭世。一九五七年九～十月，文化部和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先後召開反右派座談會，批判向達、雷海宗、陳夢家等，夏鼐作了發言。從發表的批判發言看，夏沒有涉及向達等的「私房話」。^④一九五九年，在中共中央指示要發展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入黨的背景下，由殷墟考古實習時的老友、後投奔延安成為馬克思主義考古學家的尹達介紹，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日記有夏鼐後加的少數補注和個別修改。耐人尋味的是，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讀尹達《中國原始社會》的評論，原為「以馬列主義為□□（二字原稿不清——引者注），故有時不免陷入幼稚」，後改為「以馬列主義為主導思想，故有時頗多新見解」（卷四，頁135）。從日記看，夏鼐在清華讀書時曾大量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書籍，認真讀過中譯本的《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國家與革命》等經典著作，還有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拉斯基（Laski）的《共產主義論》、布哈林（Bukhanine）的《唯物史觀社會學》等（卷一，頁23-24, 81-83, 115），可見當年馬克思主義在知識青年中的廣泛影響，也是尹達等成為「延安一代」知識分子的一個時代背景。

不過，到了風氣漸開的一九八〇年代初，晚年夏鼐的日記裡，有二次引用「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抒發讀罷《胡適往來書信選》和《胡適年譜長編》一九四〇年代後期部分的感慨（卷九，頁115, 401）。一九四〇年代後期夏在南京，曾因傅斯年赴美國醫病一度代理史語所所長，與胡適往來不少。一九四七年十月，被胡拉去列席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審查第一屆院士候選人，並分工為人文組考古及藝術史部分的院士候選人起草考語。胡還托他將人文組全部院士候選人的考語加以修正，去除帶有色調的句子，以與數理和生物兩組一致。其中對陳寅恪的考語原為：「天才最高，功力亦最勤謹，往往能用人人習知之材料，解答前人未能想到之問題，研究六朝隋唐史最精」，後簡化為「研究六朝隋唐史，兼治宗教史和文學史」（卷四，頁152）。

②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頁35-36。

③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363-364。

④ 夏鼐，〈考古工作的今昔——兩條路線的對比〉，《考古通訊》1957.6：1-4。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八三年初香港《明報月刊》一月和二月號發表余英時的長文〈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後，立即引起了大陸學界的關注。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八日日記記有，「下午至鮑正鵠同志處，送余英時關於陳寅恪先生的文章，因為院中托他處理此事也」（卷九，頁233）。鮑正鵠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局長。如何「處理」，日記沒有記。可以看到的是，一年後《明報月刊》上圍繞余英時文章出現了一場熱鬧的論戰。有關商榷和答辯文字，後來大陸和臺灣分別結集為《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⑤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二、夏鼐與傅斯年

夏鼐晚年曾回憶說，他早年在清華念書時興趣是在中國近代史方面。一九三四年一個偶然的機會通過了清華公費留學生考古學專業的考試。^⑥當年清華公費留學生（又稱中美庚款留學生）考古門全國有五名考生，包括後來曾任江西大學校長的谷霽光。夏以總平均考分72.82獲中，高出第二名15.62分（卷一，頁265）。發榜後，夏鼐即去諮詢清華的上古史教授雷海宗等，但他們對考古學也不熟悉。校中便指定校外史語所所長傅斯年、考古組主任李濟為夏鼐出國留學的指導老師。

隨後，傅、李為夏安排了出國前到殷墟的考古實習、決定改去英國留學、幫助選定導師及專業方向。夏在倫敦大學獲埃及考古學（Egyptology）博士學位回國後，一九四三年被聘為史語所副研究員，五年後升任研究員。一九四七年二月，傅赴美國醫病，破格委托年資尚淺的夏代理所務。關於這十多年間夏鼐與傅斯年的關係，李東華依據「傅斯年檔案」有所論述。^⑦日記出版前夕，日記的主要整理者、曾長期在夏鼐身邊工作的王世民在臺北史語所就有關史語所的記載作了講演。^⑧本文只就易代之際夏、傅南京分手事，略陳一二，聊作補充。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國民黨兵敗遼瀋，解放軍東進淮海，南京危急。剛回所復行所務三個月的傅斯年開始安排史語所南渡，決定將部分考古標本和圖書資料運往臺灣。十一月二十九日傳詢問夏鼐的個人計劃，夏表示「決定返家」。兩天以後，傅又問夏「能否押運古物赴臺」，夏拒絕受命（卷四，頁217-218）。十二月九日夏脫離史語所，返回故鄉浙江溫州，從此兩人天各一方。

夏鼐為甚麼沒有去臺灣？他晚年曾對來訪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張光直說是「怕傅延命所長」，「同時也不怕共」。^⑨但這是事過境遷三十多年後對外人所言，無從證明

⑤ 馮衣北，《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與余英時先生商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6）。

⑥ 夏鼐，《夏鼐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5），上冊，頁138。

⑦ 李東華，〈從往來書信看傅斯年與夏鼐的關係：兩代學術領袖的相知與傳承〉，《古今論衡》21（2010）：3-30。

⑧ 王世民，〈夏鼐與史語所——《夏鼐日記》有關記載述評〉，《古今論衡》23（2011）：19-41。

⑨ 陳星燦，〈夏鼐與張光直交往的一點史料〉，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夏鼐先生紀念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178。

一九四八年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真切思想。而日記對此沒有直接材料可供稽考。由此，以及其他多處，如一九五四年他曾刪去在悼念梁思永的文稿中的「考古所初成立時，內部情況特別複雜」（卷五，頁83），日記也幾乎未提及所中人際關係，可見《夏鼐日記》和許多人的日記一樣，在涉及敏感人事等方面，也通常會迴避或較少著墨。雖然，當年大多數知識分子選擇留下，跟隨國民黨政府去臺灣的是少數人。一九四八年當選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八十一人，去臺灣的僅九人。不過，具體到夏所在的史語所，情況有所不同。史語所是中央研究院唯一成建制地遷往臺灣的研究所。史語所三位考古學院士，除已重病復員的梁思永外，李濟和董作賓都去了臺灣。兼任史語所第一組（歷史組）主任的清華大學教授陳寅恪也一度有意去臺。儘管去留自願，但夏仍會感到所中那些對他知遇提攜的師長的壓力。

在夏鼐脫離史語所前二十天，南京《中央日報》副刊發表了他悼念考古學家吳金鼎（禹銘）的文章。其中說到他很同意這樣一種看法，「著重田野考古而輕視故紙堆中的研究」，才算是考古學的正統派，^⑩從中似乎隱約可見他此時的思想。正如後來他多次強調的，考古學和地質學、地理學等一樣，是帶有地區性的學科。既然已決心「死心塌地去幹考古學」，又不願「做第二三流事業中的第二三流人物」（卷一，頁312, 320），那也就不能離開大陸這個考古的廣闊田野，去孤島臺灣做「書齋考古學家」。以後的事實也是，不出十年，隨史語所遷臺的夏鼐舊友高去尋便嘆道，「近來中國大陸的學術崛起，至少考古組的工作已經不成爲人家的對手了」。^⑪

無論如何，夏鼐沒有去臺灣，使史語所的學術傳統在中原大地薪火相傳，影響了又一代中國考古學家。當然，此係後話，不過恐怕亦是史語所南渡諸公所樂見的。

三、夏鼐與郭沫若

「傅公」之後，「郭老」——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成爲夏鼐所敬重的上司逾四分之一世紀。一九五〇年七月十日，夏北上就任考古所副所長，在北京下車伊始便徑往謁見郭沫若。這是兩人第一次見面。夏後來回憶說，他當時很驚異，年長十八歲的「郭老」仍顯得那麼年輕，頭上沒有半根白髮。他早在清華念書時就讀了已經成名的郭沫若的著作，後來作爲史語所代理所長列席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審查第一屆院士候選人時，爲郭的當選作了有力的陳辭。關於此事，「傅斯年檔案」裡夏鼐當年致傅斯年的信件已爲學界所周知。這一段歷史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的日記裡也有記載，不僅可與信件互爲佐證，而且還提供了更多的細節：

^⑩ 夏鼐，《夏鼐文集》，頁225。

^⑪ 李卉、陳星燦編，《傳薪有斯人——李濟、凌純聲、高去尋、夏鼐與張光直通信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頁161。

關於郭沫若之提名事，胡適之氏詢問主席以離開主席立場，對此有何意見，朱家驊氏謂其參加內亂，與漢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薩總幹事謂恐刺激政府，對於將來經費有影響；吳正之先生謂恐其將來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亂發言論。巫寶三起立反對，不應以政黨關係，影響及其學術之貢獻；陶孟和先先生謂若以政府意志為標準，不如請政府指派；胡適之先生亦謂應以學術立場為主。兩方各表示意見，最後無記名投票。余以列席者不能參加投票，無表決權，乃起立謂會中有人以異黨與漢奸等齊而論，但中央研究院為 Academia Sinica，除學術貢獻外，惟一條件為中國人，若漢奸則根本不能算中國人，若反對政府則與漢奸有異，不能相提並論。在未有國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國（國民政府傾覆以後，亦仍有中國），此句想到而不須說出口，中途截止。故對漢奸不妨從嚴，對政黨不同者不妨從寬。表決結果，以 14 票對 7 票通過仍列入名單中（卷四，頁 150-151）。

一九四八年三月中央研究院正式選出第一屆院士，其中有四位考古學家——李濟、梁思永、董作賓和郭沫若。只是此時郭沫若已經轉移到香港，預備北上，並沒有前往南京接受院士稱號。

日記裡有不少讀郭沫若著作的內容，前後評論也有所變化。一九三五年讀《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序文》，「頗精粹，摘錄大要」（卷一，頁 333）；一九四九年讀〈周易的時代背景與精神生產〉，「此文前於民國二十年在北平時讀過，當時頗覺其精辟，今日觀之則疵點甚多，自信此十餘年學力頗有進展也」（卷四，頁 245）。一九七八年郭沫若去世後，夏鼐曾發表文章，謂郭「對於古文字學和銘刻學，造詣很深，尤其是對於甲骨文和金文，有很卓越的貢獻。但是他基本上還是一位書齋考古學家，不是田野考古學家」。¹²

一九四九年後，郭沫若身居大陸領導人的高位。繁忙的國務並沒有停止他晚年對歷史文物的愛好和思維。一九七二年長沙馬王堆漢墓、一九七六年安陽殷墟婦好墓的重大考古發現，夏鼐都曾帶上新出古物到郭家匯報。郭在觀摩了帶去的婦好墓古物後還說，「婦好可能是卜辭中的武丁配偶，能作戰，立了功，所以隨葬品如此豐富」（卷八，頁 72）。

但是另一方面，郭沫若晚年的一些學術文字又有失史家的客觀和公正。關於所謂「坎曼爾詩箋」的論文就是一例。文革後期的一九七一年，在北京故宮舉辦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展覽」。郭沫若看到來自新疆的文書「坎曼爾詩箋」後，在一九七二年第二期《文物》上發表了〈「坎曼爾詩箋」試探〉一文，後收入他生前出版的最後一部考古學專書《出土文物二三事》。郭將這件「坎曼爾詩箋」定為唐代文物，謂坎曼爾「是一位進步的積極分子……狹隘的民族主義或大民族主義，在他的心坎中，看

¹² 夏鼐，《夏鼐文集》，頁 246。

來是完全冰消雪化了」。¹³實際上，這件「坎曼爾詩箋」是否唐代文物十分可疑。當時古文獻專家張政烺就口頭指出過其多個疑點，不過以郭沫若的政治和學術地位，一言九鼎，「坎曼爾詩箋」不但被定為唐代文物，還曾被選入大陸中小學語文課本。文革後，夏鼐二次從新疆考古工作者處了解有關情況，一說不能確定為何處徵集來之物，並承認文書曾被描過以使字體更清楚；一說在新疆大家都知道是偽作，有人看到是描寫的，但以爲此可證八世紀已有維族住在新疆，反以辨偽爲多事（卷九，頁 8, 39-40）。

四、夏鼐與陳夢家

夏鼐在考古所年弱一歲的同事陳夢家，其學人生涯和郭沫若非常相似，都是先詩人後考古學家，而且研究方向高度一致，都以甲骨和銅器的研究見稱。不同的是，郭有雄厚的革命經歷，而陳長期生活在西南聯合大學、清華等校園裡，結局更是九天九地。

錢穆晚年回憶說，在西南聯合大學「有同事陳夢家，先以新文學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課，夢家亦來選課，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龜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獨賞夢家長衫落拓有中國文學家氣味，遂賦歸與。及是夫婦同來聯大。其夫人長英國文學，勤讀而多病」。¹⁴一九四九年後，陳夢家的自由主義秉性不移。一九五一年，陳夢家夫婦芝加哥大學留學時的舊友巫寧坤，從美國初回北京時住在燕園陳家。曾見陳夢家一聽大喇叭廣播通知，要全體師生參加集體工間操就火了，「這是『1984』來了。這麼快」。¹⁵《1984》是當時新出的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諷刺極權社會政治小說。

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陳夢家由清華轉到考古所後，日記有不少記載，兩人工作上互相信任的，陳的著作稿多先送夏審閱；夏對陳的學術成就多所肯定。日記留下了很多夏讀歷史、考古學人著作的評論，可資比較。如中央研究院院士、民族學家凌純聲的〈中國古代瑞圭的研究〉，¹⁶「雖搜集材料頗豐，敘述亦有條理，但不懂《周禮》爲儒家理想化之著作，視爲信史，又不懂考古學與古器物學，而以刻有星宿圖之玉圭爲漢代物（沿西人所著圖譜之誤），了無是處」（卷九，頁 153-154）；曾長期主持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名亞夏鼐的考古學家蘇秉琦「在北大講演的提綱〈類型學的新課題〉，閱讀一遍，錯誤甚多」（卷九，頁 59）。陳有時還向夏轉述對某些敏感的人事問題的看法，如「陳夢家君告訴我郭先生對所方不滿，有他就之意，如何在這次工作中將他安定下來」；「陳夢家君談及靳主任感覺我不易親近，希望我多與同志相接近」

¹³ 郭沫若，〈《坎曼爾詩箋》試探〉，《文物》1972.2：6。

¹⁴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頁 207。

¹⁵ 巫寧坤，《一滴淚》（臺北：遠景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02），頁 21。

¹⁶ 凌純聲，〈中國古代瑞圭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20（1965）：195。

(卷五，頁 63, 128)。陳夢家在學術上也有卓越的表現，〈西周銅器斷代〉(一～六)在夏主編的《考古學報》連載，創了這份學報的連載紀錄。一九五五年《考古通訊》(即今《考古》月刊前身)創刊，夏主編，陳夢家為副主編，出力不少，創刊號的發刊詞便是陳執筆的。

但很快他的「自由主義」等就遭到激烈批評。一九五五年八月十日，「下午學習，大家對陳夢家同志提意見，頗激烈，主要為個人自由主義及作風惡劣問題」(卷五，頁 172)。到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考古所「主要對象為陳夢家」，八月九日「陳夢家做自我檢討」，十九日「陳的檢討佔了整個上午」，二十八日「又開了一天反對陳夢家右派言行的大會」(卷五，頁 317-324)。陳夢家被劃為右派後，仍做點編輯工作，著作也在繼續。日記裡有一處很有意思的記載，在同一天裡，上午「將陳夢家《中國銅器綜錄》一書，根據容庚、于省吾及張政烺三人的意見加以修改」，下午參加整風小組「討論處理所中右派分子陳夢家辦法」(卷五，頁 350)。但陳的夫人卻撐不住了，陳兩次找夏，「謂其夫人趙蘿蕤教授以參加整風過勞，發生精神病，現住協和，但協和有擬將其移瘋人院之意」，要夏找上級「求其說項」(卷五，頁 360-361)。大概是討論的處理辦法之一，不久陳被「搬入編輯室側小辦公室內」，後作了第二批下放幹部(卷五，頁 414, 419)。

當年的公開材料中，陳夢家的右派言行之一是「污蔑」革命先輩聞一多，說在西南聯合大學時「聞一多穿一件爛長袍，為了學習連尿也不到外面去，房裏臭得很」。¹⁷而據文革後錢鍾書對夏鼐所說，聞、陳在西南聯合大學時確有過節。聞一多在昆明曾對錢鍾書說起陳夢家在《平民》上發表文章，開頭說：「請教於聞師一多，師曰……，余以為非也」，拿老師的未成熟的口頭意見作靶子，深致不滿(卷八，頁 232)。好在錢沒在陳夢家落難時爆料。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夏鼐也受到衝擊。八月九日起和陳夢家一樣，每天上午勞動，下午寫檢查。二十四日，「陳夢家被揪鬥，戴『流氓詩人』紙帽」；二十五日，「見通告牌上有紅衛兵通告，謂我所右派分子陳夢家自殺未遂」；九月三日，「聞陳夢家已於昨晚再度自殺身死」；兩天後，考古所中召開「聲討陳夢家畏罪自殺大會」(卷七，頁 237-239)。

文革後，為陳夢家補行了追悼會，夏鼐致悼詞。一九八〇年初，夏鼐讀到陳夢家一九六一～一九六六年日記手稿。在手稿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陳夢家寫道「這是最後的一天」。當晚陳服安眠藥自殺，搶救過來後返家；九月二日晚懸樑自盡。夏閱罷手稿，謂「日記太簡單，工作項下有時只寫『所』或『所如昨』，但幾乎每天都看電影、電視，有時還加評語，當然也記一些寫作篇名或參加所中學習」(卷八，頁 374)。

¹⁷ 劉昭豪整理，〈西北大學考古班駁斥陳夢家在西大的反動謬論〉，《考古通訊》1957.6：6。

五、夏鼐與張光直

張光直是遷往臺灣的史語所夏鼐舊時師友李濟、高去尋的學生，留學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並先後在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教授中國考古學。一九七三年後隨著中國大陸和美國恢復關係，張開始與夏鼐通信，繼而互訪，兩人到一九八五年夏先逝為止一直保持密切的友誼（附圖）。但是，兩人之間也留下了一樁公案。

一九九九年，張光直在〈哭童恩正先生〉一文中，披露了一九八一年哈佛和四川大學的一項宏大的中美合作考古計畫，包括由美國資助、一流學者參加的在四川大學設立幾個考古實驗室及沿四川盆地進行植物學考察，由於夏鼐的堅決反對而胎死腹中。張回憶說，那時四川大學的童恩正正在哈佛作訪問學者，獲悉美國國家科學院和中國教育部簽定了合作協定後，兩人一起草擬了計畫。恰好夏也來哈佛訪問，他們便把計畫告訴了他。夏即告訴童千萬不能與張或任何外籍考古家從事合作，並謂他在考古所任上一日，外國人就不能碰中國的古物。張又引後來聽到的小道消息說，夏先生是說到做到，從美國回京次日就驅車到教育部，幾句話，就讓張、童的計畫泡了湯。¹⁸



附圖：夏鼐與張光直在哈佛大學（1981年3月）
引自：考古學家夏鼐·影像輯編輯組編寫，《考古學家夏鼐影像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頁157。

張光直在文中遺憾地說，雖然不願，卻不能不把這一小段歷史寫出，因為這是中國近代考古學史上的一個腳注。日記的出版，使我們可以看到當事另一面的資料。有些可與張說互為佐證，有些則有出入，堪為上述腳注的一個補注。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八日記，在哈佛張光直家「飯後閑談，張、童二人提到合作考古事，說已經電話建議四川大學，川大極為重視。余告以關於考古所的事，返國後再商量」（卷九，頁28）。這是日記第一次記載此事，與張文所說基本一致。不過，關於夏返國後的一段文字，確乎是「小道消息」，不符常理。當年夏只是與教育部同級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屬下的考古研究所所長，在教育部沒有任何職務，如何可能直接對教育部講話，要他們收回成命呢？

¹⁸ 張光直，《考古人類學隨筆》（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176-180。

從日記看，夏鼐對此事高度重視。但他是循組織途徑，向他的上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有關負責人陳情，經他們向教育部交涉，而且經過了長達半年多的時間。夏返國後，先後就此事找過鄧力群、宦鄉、趙復三、梅益、于光遠。還曾邀已返國的童恩正「到自家共進午餐，加以說服，考古工作不能與外國人合作，不能貪小便宜，將研究權拱手讓人」（卷九，頁73）。但至十月底，仍沒有結果，因「教育部方面態度很僵硬」（卷九，頁82）。十一月八日夏再次至鄧力群處，「將中美聯合考古擬議的事與他說了。他立即打電話給〔教育部〕蔣南翔部長，蔣亦同意我的意見，以為不搞為是，鄧要他管一管這事」（卷九，頁84），此事才告一段落。

實際上，夏鼐對中外合作考古的態度是一貫的、公開的。被婉拒的外國學者日記中不止一見。如美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丁肇中提出的中美合作用新方法探尋秦始皇陵的計畫（卷九，頁325）。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參加北京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發現五十五周年的紀念會上，他針對著名古人類學家賈蘭坡關於國際合作的提法，發言表示「不能取與外國合作的方式」（卷九，頁420）。隨後在《考古》（1985年第4期）發表的〈評賈蘭坡等著《周口店發掘記》〉一文中寫道，有些帶有地區性的學科，如考古學、地質學、地理學等，「不要也不應該採取國際合作辦法」。

六、夏鼐與里布夫人

夏鼐一九八五年六月突然去世後一個月，他生前編定的最後一部專書《中國文明的起源》出版。這是他一九八三年三月在日本三次演講的結集，其日文版已於一年前出版。其中第二講「漢唐絲綢和絲綢之路」裡的一段話，「最近我研究了馬王堆漢墓的絲織物之後，我同意 H.B. 柏恩漢（Burhan）的意見，漢代提花織物可能是在普通織機上使用挑花棒織成花紋的。真正的提花機的出現可能稍晚。」¹⁹立即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

漢代有提花機之說原是夏鼐在一九六三年第1期《考古學報》發表的〈新疆新發現的古代絲織品——綺、錦和刺繡〉（後收入《考古學和科技史》）通過對出土漢代綺錦的分析提出的，曾被廣泛徵引。他的突然去世使他沒有來得及具體論證新說，也留下了疑問。曾長期在夏身邊從事古代絲織品保護和研究的王弻猜想，一個重要起因是漢代畫像石上有織機者甚多，但都是普通織機，沒有提花機。²⁰《考古學和科技史》曾對有織機的漢代畫像石有詳細考察。²¹

¹⁹ 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55。

²⁰ 趙豐，《王弻與紡織考古》（香港：藝紗堂/服飾出版，2001），頁148。

²¹ 夏鼐，《考古學和科技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頁138-140。

而從日記看，我疑文稿中「馬王堆漢墓」為「馬山楚墓」之誤。在一九八三年日本演講時，馬王堆漢墓的發現已歷十年，不是「最近」。自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簡單記有「參觀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絲織品」後，日記沒有再研究的記載；而有多處記載一九八二年初發現的江陵馬山楚墓出土的絲織物。馬山楚墓是繼馬王堆漢墓後，中國古代絲織物的又一次重大考古發現，謂之「最近」才符常理。實際上，日本講演第一講介紹中國考古學，專門提到新發現的江陵馬山楚墓絲織物。而第二講前後不到二小時，放了半小時的《馬王堆漢墓》電影，然後才講「漢唐絲綢及絲綢之路」（卷九，頁222）。

日本演講稿寫於訪日前夕的一九八三年二月，「主要根據在美國堪薩斯講演的英文稿」（卷九，頁215）。後者指一九八一年的英文《漢代的玉器和絲綢》，兩者唯一的重要不同就是日本講演稿中新加上了上引關於漢代提花機的一段話。²²夏鼐在寫作前一個多月，曾用放大鏡觀察了馬山楚墓絲織物的織法（卷九，頁207），並兩次閱讀彭浩〈江陵馬磚一號墓出土的編緒與絲〉一文（卷九，頁201, 202。彭浩曾參與馬山楚墓發掘，該文後以〈江陵馬山一號墓出土的兩種絲帶〉為題發表於《考古》1985年第1期）。夏鼐還在「編緒」後加注英文 tapestry，而緯絲的英文便是 silk tapestry。

一九八二年四月七日，夏鼐專程前往江陵觀看了馬山楚墓的絲織物之後，日記有謂錦中「有一種花紋最為精美，為類似緯絲的平紋組織，用挑花挑成凸起的花紋，或即所謂織成歟？」（卷九，頁123）。這裡「挑花挑成凸起的花紋」與上引「用挑花棒織成花紋」，意旨是一致的。

夏在這裡提到了「織成」這一不大為研究者注意的古代絲織品專詞，可能與他讀到的一篇考證織成的長文有關。日記記有從北京去江陵的路上讀《中國紡織科技史資料》第2輯（1-109頁）（卷九，頁122）。《科技史文集》第3輯的〈從新疆出土的三件織品談有關“織成”的幾個問題〉，²³以為漢代以來的織成和後來的緯絲在織法上一樣，都是通經斷緯的織物。作者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趙承澤，一九七九年九月曾和夏一起參加，與西德庫恩博士（Dieter Kuhen）討論中國紡織科技史的小型座談會（卷八，頁341）。可以比較的是，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夏鼐所著《考古學和科技史》，約三分之一篇幅是關於古代絲織品的，涉及綺、錦、繡、縞、縑、素、紬、紗、羅等十多個品種，但沒有織成。

日本演講稿裡提到的柏恩漢，曾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M）工作，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在發行不廣的《國際紡織史研究中心通報》（C.I.E.T.A）上發表過分析漢

²² Xia Nai, *Jade and Silk of Han China* (Kansas: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1983), pp. 50-80.

²³ 趙承澤，〈從新疆出土的三件織品談有關“織成”的幾個問題〉，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主編，《科技史文集（第3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0），頁124-137。

錦實物的研究報告。他的研究不大為中國大陸學者知曉。柏恩漢第一次見諸大陸的學術出版物便是《中國文明的起源》。日記詳細記有他與外國學者交流及所閱讀的著作，但沒有柏恩漢。不過，他與時任國際紡織史研究中心副主席的里布夫人（K. Riboud）有較多的交流。

里布夫人（1926-2000）為印度詩人泰戈爾的曾孫女，曾留學美國，後嫁與法國人，定居巴黎，從事紡織史研究。早在一九七五年，夏鼐就讀到她研究漢錦的論文（卷七，頁 493）；一九八一年曾與來訪的她「談中國絲織品史的問題」（卷九，頁 38）。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夏至返京不久的王玕（1930-1997）處談江陵馬山楚墓出土絲織品，王此前三個月在江陵幫助處理出土的絲織品。次日，他將江陵馬山楚墓的報導交給再次來訪的里布夫人，並「談國外對中國絲綢的研究」（卷九，頁 136），很可能由此談到柏恩漢的意見。因為里布夫人在國外的中國絲綢的研究同好惟柏恩漢數人而已。

或許正是由漢代畫像石上沒有提花機而假設漢代確無，江陵馬山楚墓新出土的絲織物又提供了挑花挑成花紋的織錦的考古學證據，加上織成、編緒以及與里布夫人交談到柏恩漢的看法，在夏鼐心中蘊釀，至一九八三年初就有了提花機的出現可能稍晚的新思維。

一九八二年，夏鼐從擔任了二十年的考古所所長任上退居二線。但一個月後，六月七日，他和錢鍾書一起被請去與中國社會科學院首任院長、即將晉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胡喬木談話。胡喬木說繼任的正副院長三人都是學術上不大知名的人士，考慮到名單一發表「香港和各國都要紛紛議論」，因此要夏、錢「二人掛名擔任副院長」，對外活動，借重一下（卷九，頁 140-141）。夏、錢推辭不過後，還與胡就任期一年還是三年「討價還價」，最後胡喬木仍定一任三年。可惜二年後，夏鼐像他的老師長傅斯年一樣，在任上突發腦溢血去世。日記止於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七日，「上午坪井清足來所講演，談《日本的考古學》」（卷九，頁 476），下午突然病倒至二天後去世再未醒來。不像他的老同事陳夢家，直面死亡，在簡單的日記末尾寫上「這是我最後的一天」。夏鼐留下了這部長長的日記，字數遠多於他生前編定的學術專書；而且，與僅供少數專家參考的學術專書不同，日記相信將會長久被更多的後人研究和取閱。

引用書目

王世民

2011 〈夏鼐與史語所——《夏鼐日記》有關記載述評〉，《古今論衡》23：19-41。

余英時

1998 《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李東華

2010 〈從往來書信看傅斯年與夏鼐的關係：兩代學術領袖的相知與傳承〉，《古今論衡》21：3-30。

李卉、陳星燦編

2005 《傳薪有斯人——李濟、凌純聲、高去尋、夏鼐與張光直通信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巫寧坤

2002 《一滴淚》，臺北：遠景事業出版有限公司。

夏鼐

1957 〈考古工作的今昔——兩條路線的對比〉，《考古通訊》1957.6：1-4。

1979 《考古學和科技史》，北京：科學出版社。

1985 《中國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5 《夏鼐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1 《夏鼐日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卷一～一〇。

張光直

1999 《考古人類學隨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陳星燦

2009 〈夏鼐與張光直交往的一點史料〉，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夏鼐先生紀念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頁177-181。

郭沫若

1972 〈《坎曼爾詩箋》試探〉，《文物》1972.2：1-6。

陸鍵東

1995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趙豐

2001 《王弼與紡織考古》，香港：藝紗堂/服飾出版。

劉昭豪

1957

〈西北大學考古班駁斥陳夢家在西大的反動謬論〉，《考古通訊》
1957.6：5-6。

錢穆

2005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Xia, Nai

1983

Jade and Silk of Han China. Lawrence, Kan.: Helen Foresman Spencer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Kansas.